

父母冲突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认知反应性的中介作用*

王娟娟¹, 王宏伟¹, 潘 娣¹, 宋广文²

(1. 曲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曲阜 273165; 2.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州 510641)

摘 要:采用父母冲突儿童知觉量表(CPIC)、抑郁体验问卷(DEQ)、莱顿抑郁敏感指数量表(LEIDS)测量753名高中生,以便分析认知反应性在父母冲突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父母冲突显著正向预测认知反应性;认知反应性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2)认知反应性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抑郁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因此,认知反应性作为中介变量,父母冲突通过认知反应性对青少年抑郁具有稳定的间接作用。

关键词:父母冲突;认知反应性;抑郁;青少年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18)03-0273-06

1 引言

抑郁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检出率在20%~44%之间,且呈快速增长趋势(于凤杰,赵景欣,张文新,2013)。在世界范围内,抑郁位列导致残疾和疾病负担的五大主要原因之一(Caspi et al., 2003),已成为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隐形“杀手”。近年来在抑郁认知理论的影响下,大量学者开始重视抑郁认知易感素质在青少年抑郁问题中的作用。理论及实证研究均表明,认知反应性(Cognitive Reactivity, CR)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易感素质,是抑郁产生、维持及复发的关键因素(Kovacs & Beck, 1978)。而家庭不仅是个体最早、最经常的生存环境,同时也是身心素质养成的重要生态系统。所以,无论从抑郁的科学预防还是有效干预的角度看,理清认知反应性这一抑郁认知易感素质与家庭因素之间的关系都十分有必要。

根据Bronfenbrenner(1986)的家庭系统理论,夫妻系统是家庭系统的基石。夫妻关系的好坏会对其它子系统产生决定性影响,进而影响整个家庭系统的质量。夫妻冲突是夫妻关系的主要影响变量之一。夫妻冲突是指夫妻之间观点不一致或其他原因而导致的言语争执或身体攻击,一般通过冲突频率、冲突强度以及是否得到解决来界定(Cui & Fincham, 2010)。夫妻冲突对于青少年而言即为父母冲突。认知-情境理论及情绪安全感理论,是解释父母冲突影响青少年内化问题的经典理论。以这两个理论为基础,研究者在该领域开展了大量实证研究,

例如Keeports(2013)的研究表明,青少年威胁评估及自责在父母冲突与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同样Beard(2014)的研究发现,父母冲突可能通过引发儿童、青少年的消极认知评估进而引发抑郁体验;与此类似,Rudolph等(2014)指出,父母关系通过提高青少年对拒绝威胁的情绪敏感性从而预测抑郁。这些研究结果无疑都为这两个经典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基于此,该研究推测,父母冲突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

父母冲突对于青少年而言还具备如下特点:第一,父母冲突本身通常引起青少年强烈的消极情感体验。情绪安全感理论(emotional security theory, EST)认为,高频率、高强度的父母冲突会给青少年带来情绪压力,增加消极情绪及情绪不安全感(Fosco & Grych, 2008; 王玉龙,覃雅兰,肖璨,蔺秀云, 2016)。第二,父母冲突会直接或间接地向青少年传达消极自我相关信息。根据溢出理论,夫妻关系中的消极情感和消极行为可能会外溢到亲子关系中(Erel & Burman, 1995),父母冲突会导致父母对孩子采取更多包含愤怒、敌意以及批评的行为(Harold & Conger, 1997)。Almeida等(1999)研究指出,父母冲突后,父亲和母亲在日常亲子互动中,采取不良管教行为的概率分别高达60%和41%。Rose和Abramson(1992)的无助理论强调,当青少年遇到消极事件时,高父母批评、愤怒及敌意的家庭环境会向青少年传达,是其自身某种程度上的缺陷导致了消极事件发生且应该为消极事件负责的信息(Ingram,

* 基金项目:2016年度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专项研究课题(2016MZXY06),广州新岭南文化中心研究基地项目“广州新移民文化认同与城市归属感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通讯作者:宋广文, E-mail: songhw@scut.edu.cn。

2003),青少年会将这些直接或间接反馈内化,进而形成自责、羞愧、低自我价值等消极认知风格。在高父母冲突家庭中,陷入自身婚姻问题中的父母消耗了本该用于教导孩子的有效资源,所以当孩子遇到挫败事件时,父母不能及时给予孩子有效的心灵抚慰和理性指导,反而反馈以批评、指责,从而使孩子产生自己不值得被爱或者因为自己的无能而导致了失败等消极思维。另外,青少年阶段自我感知能力建构是其主要发展任务(Harter,2003),大脑发展尤其快速(Spear,2007),情感-认知联结最容易形成(Cole et al.,2014)。而认知反应性正是一种消极情绪-消极认知联结。认知反应性(Cognitive Reactivity,CR)被定义为,轻微(非病理性)情绪波动激发不良认知或认知风格的相对容易度(Williams, Van der Does, Barnhofer, Crane, & Segal, 2008)。它不等于不良认知的存在或消极情绪的出现,而是一个联结强度结构,反映消极情绪及相关特征激发个体不良认知的程度。Cole等(2014)认为,认知反应性是一种习得性联结,由一系列能够诱发消极情绪并同时传达不良、自我相关信息的生活事件反复刺激生成。换言之,正是消极情绪和消极自我相关信息反复配对地呈现,使个体建立了消极情感-消极认知联结,即认知反应性。Beck(1987)认为,个体的不利经历促使认知反应性等抑郁易感素质的形成。而父母冲突恰好具备了认知反应性形成的条件,是青少年认知反应性产生的“温床”。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测,父母冲突作为个体的不利成长经历,可能促使青少年认知反应性这一抑郁易感素质的形成。

根据素质-应激模型(diathesis-stress model),认知反应性是抑郁最重要的认知易感素质之一(Scher, Ingram, & Segal, 2005)。认知反应性显著正向预测抑郁(Brockmeyer, Pfeiffer, Holtforth, Immermann, Kämmerer, & Friederich, 2012)。Figuroa和Ruhé等(2015)历时3.5年的研究也表明,是认知反应性而非不良认知预测个体抑郁。在此我们可以做出建设性的推测,具有认知反应性的个体遇到消极事件时,其情绪-认知通路被激活,此时个体不仅有悲伤情绪还伴有否定自我等失调性认知及消极归因,从而出现无助、失落、伤心等抑郁情绪。迄今为止,尚缺乏直接检验认知反应性是否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抑郁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的研究。

综上,该研究以家庭系统理论和素质-应激模型为基础,探讨青少年认知反应性在父母冲突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从而为青少年抑郁防治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具体研究假设如下,假设H₁:父母冲突

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假设H₂:父母冲突正向预测青少年认知反应性;假设H₃:认知反应性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并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取山东省两所中学高中生进行测量。发放问卷780份,回收有效问卷753份,回收率97%。其中,男生333人,女生420人。高一381人,高二372人。被试平均年龄为16岁($SD=0.79$)。

2.2 研究工具

2.2.1 父母冲突儿童知觉量表(Children's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Scale, CPIC)

采用池丽萍等(2003)修订的父母冲突儿童知觉量表。根据以往研究(Grych, Fincham, Jouriles, & McDonald, 2000),选取父母冲突特征分量表,即冲突频率和冲突强度及冲突解决作为父母冲突的测量指标共18题,采用5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儿童知觉到的父母冲突越严重。该研究对三维度模型做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下: $\chi^2/df=3.39$, NNFI=0.95, CFI=0.97, GFI=0.95, SRMR=0.03。这表明拟合良好,模型可接受。实测时冲突频率、冲突解决和冲突强度分量表的Cronbach's α 分别为0.74、0.73和0.71。

2.2.2 抑郁体验问卷(Depression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 DEQ)

抑郁体验问卷(DEQ)由Blatt及其同事编制, Welkowitz, Lish 和 Bond(1985)修订。该研究选择前两个维度共35题,采用7点计分,测量个体抑郁体验,对两维度模型做验证性因子分析,拟合指标良好,结果如下: $\chi^2/df=5.54$, NNFI=0.90, CFI=0.90, GFI=0.91, SRMR=0.05。实测人际依赖和自我批评分量表的Cronbach's α 分别为0.83和0.73。

2.2.3 莱顿抑郁敏感指数量表(LEIDS-RR)

采用Van der Does等编制的莱顿抑郁敏感指数量表修订版(LEIDS-RR),测量个体对于悲伤情绪的认知反应性(Solis, Antypa, Conijn, Kelderman, & Van der Does, 2016)。采用翻译-回译的方式,先请英语专业老师对量表进行翻译,同时请心理学专业的老师对量表进行回译和修正,并在小组内对题项的合理性进行讨论。问卷统一采用5点计分。根据Van der Does的观点,回避应对维度可以作为五维度量表简版,所以该研究选择回避应对维度共8题,测量

认知反应性。该研究中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单因子模型对数据拟合良好,结果如下: $\chi^2/df = 3.92$, $NNFI = 0.91$, $CFI = 0.94$, $GFI = 0.92$, $SRMR = 0.04$ 。实测时回避应对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73。

2.3 施测程序

以班级为单位,在两名心理学专业学术硕士的指导下,使用统一问卷进行集体测试。指导语强调作答的真实性及个人信息的保密性原则。

2.4 分析思路

采用 SPSS 19.0 和 Amos 17.0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思路如下:(1)对各主要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并计算相关矩阵;(2)分析认知反应性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

为了减少自陈问卷法带来的共同方法偏差,该

研究在数据收集过程中通过强调匿名、保密等进行程序控制。使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检验程序控制的效果(Podsakoff, MacKenzie, & Podsakoff, 2003),将三个变量放在一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有 13 个,且第一个因子的解释率为 18.10%,小于 40%,说明该研究的共同方法变异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3.2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表 1 列出了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皮尔逊积差相关矩阵。相关分析表明,认知反应性与抑郁、父母冲突显著正相关;抑郁和父母冲突显著正相关;认知反应性与抑郁的两个维度以及父母冲突的三个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变量之间的相关模式与研究假设的变量关系模式一致,符合路径分析的前提条件。

表 1 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矩阵(N = 753)

	M	SD	1	2	3	4	5	6	7
1. 认知反应性	2.58	0.71	1						
2. 抑郁	3.73	1.17	0.57**	1					
3. 父母冲突	2.32	0.71	0.26**	0.26**	1				
4. 冲突频率	2.34	0.83	0.30**	0.30**	0.90**	1			
5. 冲突解决	2.24	0.85	0.20**	0.15**	0.84**	0.61**	1		
6. 冲突强度	2.38	0.79	0.21**	0.25**	0.87**	0.71**	0.57**	1	
7. 人际依赖	3.78	1.30	0.49**	0.92**	0.19**	0.21**	0.10*	0.18**	1
8. 自我批评	3.62	1.22	0.56**	0.94**	0.30**	0.32**	0.18**	0.28**	0.73**

注: * $p < 0.05$, ** $p < 0.01$ 。

3.3 父母冲突影响青少年抑郁的直接和间接效应检验

该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父母冲突影响青少年抑郁的直接和间接效应进行检验。在控制性别、年级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基础上,首先对父母冲突和抑郁按维度分别打包为 3 个指标和 2 个指标。

3.3.1 父母冲突对于青少年抑郁的直接效应检验

以父母冲突为外源潜变量,以抑郁为内生潜变量构建图 1 所示的无中介模型 M_1 ,以检验父母冲突对抑郁的直接预测效应。模型 M_1 数据拟合良好具体结果见表 2。父母冲突对青少年抑郁的直接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eta_{\text{父母冲突} \rightarrow \text{抑郁}} = 0.28, p < 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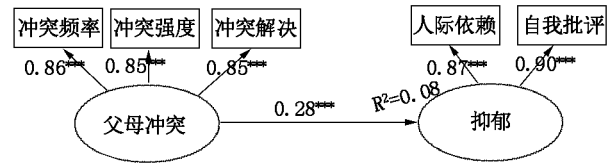


图 1 父母冲突对青少年抑郁的直接效应模型 M_1

3.3.2 认知反应性对于父母冲突与青少年抑郁的中介效应检验

以父母冲突为外源潜变量,以认知反应性和抑郁为内生潜变量构建图 2 所示的中介模型 M_2 ,以检验认知反应性在父母冲突与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饱和模型 M_2 的检验结果见表 2,模型拟合良好。另外,通过表 2 的结果也可以看出中介作用模型 M_2 优于无中介作用模型 M_1 ,这表明中介作用模型拟合效果更好。在中介作用模型 M_2 中,父母冲突对抑郁的直接正向预测效应不再显著($\beta_{\text{父母冲突} \rightarrow \text{抑郁}} = 0.08, p > 0.05$),父母冲突对认知反应性及认知反应性对抑郁均为显著的正向预测效应($\beta_{\text{父母冲突} \rightarrow \text{认知反应性}} = 0.33, p < 0.001$; $\beta_{\text{认知反应性} \rightarrow \text{抑郁}} = 0.68, p < 0.001$)。这表明,父母冲突通过认知反应性的完全中介作用显著正向预测抑郁。对结构方程模型参数估计及中介效应检验,采用方差极大似然法和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选定的 Bootstrap 自行取样量为 2000。结果显示,认知反应性的

中介效应量 $ab = 0.22$, 且认知反应性中介效应 95% 的置信区间为 $[0.165, 0.313]$ 不包括 0, 说明所得中介值具有可信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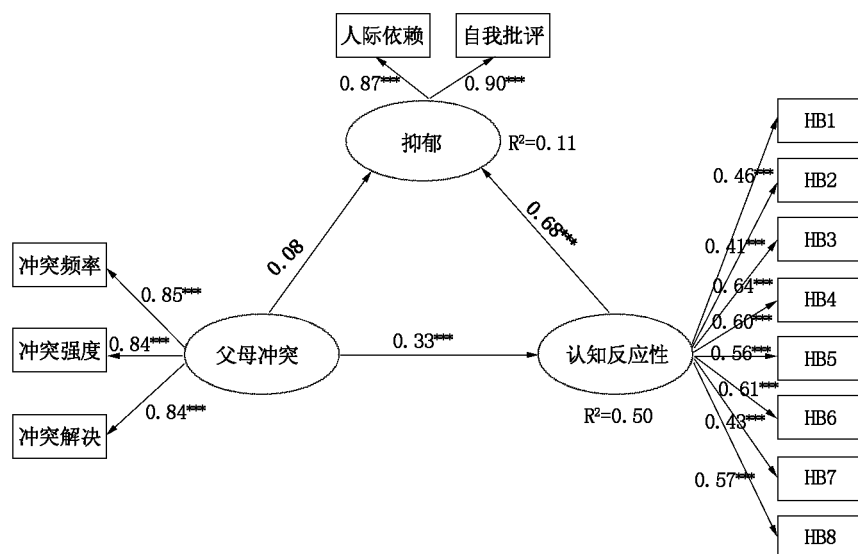


图2 认知反应性在父母冲突和青少年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M_2

表2 M_1 与 M_2 模型拟合指数

模型	χ^2/df	NNFI	CFI	GFI	SRMR
M_1	15.25	0.91	0.90	0.91	0.06
M_2	4.37	0.91	0.92	0.94	0.04

4 讨论与分析

4.1 父母冲突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

该研究考察了父母冲突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结果表明,父母冲突与青少年抑郁显著正相关,即父母冲突越多,青少年抑郁越严重。该结果与以往研究一致(Wood, Lim, & Miller, 2013)。父母关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正如“阶段-环境匹配理论”倡导的那样,应该努力营造积极、和谐的家庭环境。当情境提供的条件适应青少年阶段发展任务时,将会促进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Goodier, 2014)。青少年时期是自我意识建构、自我概念建立阶段,需要周围人积极的评价和引导,同时对别人的评价十分敏感,当父母能够满足青少年的这些发展需要时,他们会产生积极正确的自我与他人认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从而心理得以健康发展。积极、相互支持的亲子关系会促使良好亲子依恋的形成,而这种安全依恋正是抑郁情绪的保护因素(Duchesne & Ratelle, 2014)。这一结果与发展情境理论(Lerner, 2002)强调个体所处的环境及与环境的互动质量影响个体社会适应的观念相统一。国内学者关于父母冲突的研究也表明,父母冲突与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紧密相关,父母冲突越多,家庭氛围越差,则青少年自伤、抑郁、焦虑等行为

越多(王明忠等, 2014; 王玉龙等, 2016)。换句话说,父母冲突越少,父母关系越和谐,家庭氛围越温馨、积极,青少年问题行为越少。结合已有研究,不难发现,父母冲突是导致青少年抑郁的重要家庭因素,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这也提示我们,在实践过程中,要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有效家庭干预。此外,虽然以往研究已经发现,父母冲突对青少年抑郁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但是只对认知评估、威胁知觉及拒绝敏感性等机制进行了探讨,直接检验认知反应性是否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抑郁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的研究较少。该研究对此进行了重点探讨并且得到了有意义的发现,对本领域的研究进行了完善与补充。

4.2 认知反应性的中介效应

该研究发现,认知反应性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抑郁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一方面,父母冲突是青少年抑郁的重要风险因素。长期经历父母冲突的个体,会把父母对自己的批评指责内化为自身的问题,从而影响自我价值感的形成和情绪适应(Brownfield & Thompson, 2005)。Ingram 和 Ritter(2000)的研究表明,童年期不良亲子互动会提高青少年的认知反应性进而引发抑郁。Cole 等(2014)的研究也表明,粗暴养育是青少年认知反应性的相关发展因素。个体认知反应性水平越高,意味着消极情绪与消极认知的联结越强。这种认知结构形成后一直处于潜伏状态直到被应激性事件激活(Ingram, Miranda, & Segal, 1998),此类个体遇到应激事件时,不仅有消极

情绪体验同时伴随强烈的失调性自我认知、自我评价及自责归因,从而导致抑郁情绪(Cole et al., 2014; Williams et al., 2008)。这符合“素质-应激”模型的基本观点:当处于应激状态时,具有某种素质的个体更容易出现心理与行为问题。总之,上述中介效应表明,认知反应性可能是父母冲突影响青少年抑郁的一种重要机制,父母冲突可以通过影响个体消极情绪与消极认知的联结进而影响抑郁情绪。

4.3 实践意义

该研究引入认知反应性来解释父母冲突影响青少年抑郁的内在机制,对现有的实践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首先,该研究提示父母要重视家庭氛围及亲子关系对青少年抑郁产生的作用,通过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例如,提高夫妻之间的沟通交流水平、及时有效地解决冲突、减少冲突情境,从而降低青少年抑郁体验。要想让孩子健康发展,夫妻二人应该先把自己的婚姻关系经营好,给家庭系统良性发展创造前提条件。其次,可以从降低青少年认知反应性入手来减少抑郁体验。可以类比条件反射的形成与消退,既然认知反应性是经过同时引发消极情绪与消极认知的应激事件反复刺激生成,那么相关工作人员或许可以从心理治疗的角度,通过降低消极情绪与消极认知的联结强度来逐渐使这种联结消退。

参考文献

- 池丽萍,辛自强.(2003). 儿童对婚姻冲突的感知量表修订.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7(8), 554-556.
- 王玉龙,覃雅兰,肖臻,蔺秀云.(2016). 父母冲突与青少年自伤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心理发展与教育*, 32(3), 377-384.
- 王明忠,范翠英,周宗奎,陈武.(2014). 父母冲突影响青少年抑郁和社交焦虑——基于认知. 情境理论和情绪安全感理论. *心理学报*, 46(1), 90-100.
- 于凤杰,赵景欣,张文新.(2013). 高中生的个人规划与抑郁的关系:性别的调节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29(1), 79-85.
- Almeida, D. M. W., Elaine, C., & Amy, L. (1999). Daily transmission of tensions between marital dyads and parent-child dyads. *Journal of Marriage & Family*, 61(1), 49-61.
- Bronfenbrenner, U. (1986). Ecology of the family as a context for human development: Research perspectiv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2(6), 723-742.
- Beard, R. (2014). *Children's appraisals as a mediating factor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child adjustment*. Dissertations & Theses - Gradworks.
- Beck, A. T., Brown, G., Steer, R. A., Eidelson, J. I., & Riskind, J. H. (1987). Differentiating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 test of the cognitive content-specificity hypothesi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96(3), 179-183.
- Brockmeyer, T., Pfeiffer, N., Holtforth, M. G., Zimmermann, J., Kämmerer, A., Friederich, H. C., & Bents, H. (2012). Mood regulation and cognitive reactivity in depression vulnerability.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36(6), 634-642.
- Brownfield, D., & Thompson, K. (2005). Self-concept and delinquency: The effects of reflected appraisals by parents and peers. *Western Criminology Review*, 6(1), 22-29.
- Caspi, A., Sugden, K., Moffitt, T. E., Taylor, A., Craig, I. W., & Harrington, H. (2003). Influence of life stress on depression: moderation by a polymorphism in the 5-HTT gene. *Science*, 301(5631), 386-389.
- Cui, M., & Fincham, F. D. (2010).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parental divorce and marital conflict on young adult romantic relationship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7(3), 331-343.
- Cole, D. A., Martin, N. C., Sterba, S. K., Sinclair-McBride, K., Roeder, K. M., & Zelkowitz, R. (2014). Peer victimization (and harsh parenting) as developmental correlates of cognitive reactivity, a diathesis for depression.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23(2), 336-349.
- Duchesne, S., & Ratelle, C. F. (2014). Attachment security to mothers and fathers and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adolescence: Which parent for which trajectory?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3(4), 641-654.
- Erel, O., & Burman, B. (1995). Inter-relatedness of marital relations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8(1), 108-132.
- Fosco, G. M., & Grych, J. H. (2008). Emotional, cognitive, and family systems mediators of children's adjustment to interparental conflict.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2(6), 843-854.
- Figueroa, C. A., Ruhé, H. G., Koeter, M. W., Spinhoven, P., Van, D. D. W., & Bockting, C. L. (2015). Cognitive reactivity versus dysfunctional cognitions and the prediction of relapse in recurrent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 76(10), e1306-12.
- Grych, J. H., Fincham, F. D., Jouriles, E. N., & McDonald, R. (2000).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child adjustment: Testing the mediational role of appraisals in the cognitive-contextual framework. *Child Development*, 71(6), 1648-1661.
- Goodier, J. (2014).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environment in human development*. Reference Reviews.
- Harold, G. T., & Conger, R. D. (1997). Marital conflict and ad-

- olescent distress; The role of adolescent awareness. *Child Development*, 68(2), 333 – 350.
- Harter, S. (2003). The development of self – representations during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Handbook of self and identity* (pp. 610 – 642). New York, NY: Guilford – Press.
- Ingram, R. E. (2003). Origins of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27(1), 77 – 88.
- Ingram, R. E., & Ritter, J. (2000).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Cognitive reactivity and parental bonding in high – risk individual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09(4), 588 – 596.
- Ingram, R. E., Miranda, J., & Segal, Z. V. (1998).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Guilford – Press.
- Kovacs, M., & Beck, A. T. (1978). Maladaptive cognitive structures in depress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5(5), 525 – 533.
- Keeports, C. R. (2013). *Interparental conflict, young adult adjustment, and appraisals: The moderation effects of parent – child relationship quality*. Dissertations & Theses – Gradworks.
- Podsakoff, P. M., MacKenzie, S. B., Lee, J. Y., & Podsakoff, N. P. (2003). 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8(5), 879 – 903.
- Rudolph, J., & Zimmer – Gembeck, M. J. (2014). Parent relationships and adolescents' depression and social anxiety: Indirect associations via emotional sensitivity to rejection threat. *Austral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66(2), 110 – 121.
- Rose, D. T., & Abramson, L. (1992). Developmental predictors of depressive cognitive style: Research and theory.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s on Depression* (pp. 323 – 349).
- Spear, L. (2007). The developing brain and adolescent – typical behavior patterns: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In D. Romer & E. F. Walker (Eds.), *Adolescent psychopathology and the developing brain: Integrating brain and prevention science* (pp. 9 – 3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er, C. D., Ingram, R. E., & Segal, Z. V. (2005). Cognitive reactivity and vulnerability: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construct activation and cognitive diatheses in unipolar depression.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5(4), 487 – 510.
- Solis, E., Antypa, N., Conijn, J. M., Kelderman, H., & Van, D. D. W. (2016).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leiden index of depression sensitivity (LEIDS).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9(2), 158 – 171.
- Williams, J. M. G., Van der Does, A. J. W., Barnhofer, T., Crane, C., & Segal, Z. S. (2008). Cognitive reactivity, suicidal ideation and future fluency: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a differential activation theory of hopelessness/suicidality.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32(1), 83 – 104.
- Welkowitz, J., Lish, J. D., & Bond, R. N. (1985). The depressive experiences questionnaire: Revision and valid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s*, 49(1), 89 – 94.
- Wood, B., Lim, J., & Miller, B. (2013). Effects of caregiver depression on child depression and asthma: Mediation by inter – parental conflict and negative parenting. *European Respiratory Journal*, 42 (Suppl 57), P4308.

Influence of Inter – parental Conflict on Adolescents' Depression: Mediating Effect of Cognitive Reactivity

Wang Juanjuan¹, Wang Hongwei¹, Pan Di¹, Song Guangwen²

(1. School of Education,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2. School of Marxism,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

Abstract: The Children's Perception of Inter – parental Conflict Scale, Depressive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 and Leiden Index of Depression Sensitivity were administered to 753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gnitive reactivity between inter – parental conflict and depression. Results indicated that: ① Inter – parental conflict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adolescents' cognitive reactivity; Cognitive reactivity also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adolescents' depression; ② Adolescents' cognitive reactivity could completely mediate the path from inter – parental conflict to depression symptoms. Therefore, these findings demonstrate cognitive reactivity is an important mediating mechanism between inter – parental conflict and depression.

Key words: depression; cognitive reactivity; inter – parental conflict; adolescents